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谢 静 著

传播的社区

——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传播构成社区”这一观念是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社区与组织之发展与创新的。传播的社区，凸显了传播的行动能力：在社会大变革中，传播行为通过动员、联合自由的个体，以形成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集体，从而促进社会团结与协商合作。



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谢 静 著

传播的社区

——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谢静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当代中国媒体观察丛书)
ISBN 978-7-309-10104-1

I. 传… II. 谢… III. 社区-大众传播-研究-中国 IV. 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1707 号



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谢 静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04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04-1/G·1239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编号NCET-12-0138)的支持,特此鸣谢!

丛 书 序

中国改革开放激荡的 35 年,也是中国传媒业大发展的 35 年。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创新,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提升,这些既可以看做中国传媒业砥砺前行的大背景,同时也能体现出媒介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紧密勾连。

全球化的浪潮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改革与传媒业的发展也不再是关起门来自己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与全球频调同步。世界性的话题会有中国版本,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有世界因素渗入。通过媒介,个体得以同世界对话。而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中介,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前所未有地重要。毫不夸张地讲,在现今这个信息社会,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由各种媒介搭建起来的信息空间,很少会被人意识到其存在。

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的覆盖面如此广阔,作用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它?而认识的下一步则是要问,对于媒介我们有着怎样的诉求?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无法对话,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在过程中不断明确媒介化社会中“人”的主体地位。只有从“人”的本真出发,去思考,去研究,去给出设想和规划,并付诸实践,才可以不为霸权操控,不受资本蛊惑,不被技术奴役。

本系列精选了当前新闻传播学科中最新、最具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包括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历时四年覆盖全国的受众调查报告;针对风险社会六大热点问题定向进行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分配热点报道的研究;以传播为核心理论视角重构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耗费了作者大量的时间与



精力，思路深邃开阔，论证严谨扎实，富有想象力和人文关怀。

我们希望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用社会调查实证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摸清在中国多种媒介并存发展的现实语境下，“政府-市场-媒介-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以多点切入专题关注案例分析的形式梳理出社会核心问题的媒介呈现，以此来反思传媒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担当；变“结构中的传播”为“经由传播而组织”，真正从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事物的建构过程以充实新闻传播学的核心理论。

诚然我们的愿景美好，但实践起来并非易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在此耗费心力心血。一个人、一本书的作用有限，但我们更愿意用今天的辛苦换取整个社会对“媒介如何发展以促进国家振兴与社会和谐”的关注反思，我们相信路虽遥远，但只要开始思考，就已经在路上了。

记得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自我之歌》中将自我的意识扩大成为民族意识和宇宙意识，并将两者合二为一，于是心灵自由，国家兴旺。中国梦，梦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之路弥坚，更需要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与诸位共勉。

“我走在永恒旅途上，
我的标志是一件雨衣、一双好鞋，
和从树林中砍来的一根手杖。
我的朋友谁也不在我的椅子上休憩，
我没有椅子，没有教堂，没有哲学，
我不把任何人领到餐桌边、图书馆或交易所去。
我只是领着你们，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到一座小山丘上，
我左手挽住你，
右手指向各个大陆的风景，和那条大道。”

李良荣

2013年9月于复旦

在个体化与全球化影响日甚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令人炫目的传播革命,人们不禁要问:社区与组织等传统的社会构成形式是否依然具有价值?学者们的回答往往相互对立,正反不一。肯定的观点认为,社区和组织依然大量存在,说明他们仍然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否定者则认为,社区和组织本身已发生巨大变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已大为减弱,在某些领域甚至不复存在。

其实,有关社区等社会构成形式的问题,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社区等社会构成形式是否存在;第二,这些形式是否有必要存在。也许在个体化、媒介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社区与组织面临了许多危机,甚至在有些地方已被宣布死亡,但是从社会建设和团结协作的角度来看,社区和组织不仅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应该大力促进其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社区和组织理解也应当随着社会日益个体化、全球化和媒介化的形势而有所改变,应将其视为促进社会支持和团结协作的资源而非限制因素。

以社会支持和团结协作的方式看待社区与组织,同时意味着摒弃封闭与静止的思想,从开放与流动的观念来看待它们,即不再把它们看做既成事实和对人的限制;相反,人们现在可以更加灵活地穿行于各种社区与组织之间,从个体化与全球化的环境中获得更多支持。不过,这样的观念又将我们重新推到有关社会构成的原初问题面前:在开放与流动的前提下,社区与组织如何可能?如果社区与组织不是从来就有、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社区与组织究竟是怎样构成的?作为传播学



者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区、组织等社会形式均由传播而构成:由传播互动将人们联系起来,编织成网络,并赋予意义、形成认同。我们在此强调传播的作用,并非表明传统社区或组织就没有传播,但传统的理解往往将社区或组织视为先验的存在,传播只是发生于其间的特定活动。而“传播构成”的观念则认为,正是传播活动型塑了社区和组织等社会构成形式。

传统的理解有着特定的社会与学术背景。社区与组织观念都诞生于现代化早期。虽然组织古已有之,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科层制组织特征则是现代化、工业化的产物。社区概念则相反,滕尼斯(F. Tonnies)所推崇的社区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被“社会”逐步取代以后才被“发现”的,此后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挽回或重建社区(滕尼斯,1999)。但是,随着个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社会流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传播革命则使得特定空间内、面对面的沟通不再必不可少。社区与组织的边界被打破,甚至结构本身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社区与组织不再被视为界限分明、结构严谨的封闭系统,而是动态、流动并与环境高度互动的网络。当然,社区和组织也并非不再有边界——那样将彻底取消社区和组织这些构成形式,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与活动以维护边界。重要的是,这些边界维护活动的核心就是传播。另外,在动态边界之内,人们的联系也更为灵活多变,传统的地域空间或者科层结构都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通过各种互动活动将空间与人进行动态关联。

在这种情势下,社区、组织这些社会构成形式本身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日益模糊,标志着社区的地域因素和标志组织的结构因素都不断被解构,而意义建构与关系网络的共享特征越来越突出。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命名这些变化以取代社区和组织的概念,比如威尔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Wellman, 2002),克罗齐耶与费埃德博格(M. Crozier & E. Friedberg)的“行动者系统”等(2007)。这些概念都很敏锐地抓住了社会构成形式的某些新现象或新问题,极富

启发。不过,从实际应用来看,传统的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区、组织之类的概念仍然是人们讨论社会构成的主要话语。这提醒我们不要随意割裂传统,因为传统常常也是建构的。比如,当我们以开放、流动的观念去看待传统的社区与组织将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它们也并非如之前所想象得那样边界清晰、结构井然!

所以在此,我们依然采用传统的社区、组织概念,但突出其建构和构成的特性,即强调传播的作用。简洁起见,我将其命名为“传播的社区”,其中包括通常所说的社区、组织、网络等社会构成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社区一词相对较为宽泛,既可以是特定地域空间中的社会构成形式(如邻里街坊),也可以是虚拟的、精神的联合(如虚拟社区);既可以无目的的,也可以有目的[在费孝通(1985)看来,传统的乡村社区是无目的的,而城市社区则有目的]。相对而言,组织一词感觉更为正式、范围更为狭窄,除了一些具有特定结构与秩序的形式我们仍然称其为组织以外,本书主要关注作为动词的组织过程,即关注经由传播而组织起来的过程,而组织与合作正是本书探讨社区问题的主要目的。网络也是描述社区互动结构的主要概念,但无法涵盖意义建构的层面,也没有边界感,因此无法替代社区或组织概念,本书主要用其描述社区构成的形态特征。

概言之,我们在此讨论的社区是混合了组织、网络等现象的社会构成形式,一方面我们藉此强调它灵活多变的网络形态,另一方面则突出它的组织过程,即将其视为人们联合、协作的动态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些过程是通过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传播构成社区。如此理解的原因,既建基于环境、社区与组织本身的变化,更是出于对传统概念的反思;而研究的目的则是希望阐明:在社会大变革中,传播的社区如何动员、联合自由的个体,以形成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集体,从而促进社会团结与协商合作。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念既不割断历史、脱离语境,又能够体现反思与发展。“传播的社区”概念突出了传播要素,反映了传播构成的理念,是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社区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



因为,在传统的社区与组织研究中,传播往往只是诸多要素或过程之一;即使社区传播或组织传播研究也只是从具体的传播现象或者问题出发,仍然将传播置于社区或组织之内,而很少将传播与它们的构成相关联。这样不仅降低了传播的价值,而且妨碍了人们深入理解开放与流动中的社区构成之过程与形式,从而误解社区本身。所以,“传播的社区”观念不是传播学者的自我标榜,而是力图见人所未见,以新的视角来丰富有关社区与传播的理论研究。

本书所谓传播包括多个维度:信息传递、仪式互动和精神传承等,既关注传播的文本形式,也注重传播的意义内涵。另外,本书所使用的构成概念,主要是在吉登斯(A. Giddens)的意义上使用,因此不仅仅包含意义的社会建构,还包括组织的形式与规则等,有时还涉及物质层面的内容,比如社区空间与建筑等(吉登斯,1998)。当我们说传播构成社区时,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象征互动所形成的共享意义和认同,也包括人与物之间经过传播行为而关联起来的网络。

本书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传播的视角探讨组织与社区概念,阐述“作为传播构成的社区”以及“经由传播而组织”的基本理论观点,这是本书的理论核心。接下来的三章分别研究三种社区形式:第二章侧重于具有地理和空间属性的社区,探讨在媒介与传播的作用下,社区空间进行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第三章侧重于阐释性社区,即通过意义共享而形成的想象共同体;第四章侧重于具有一定结构与秩序的社区,即组织,本书将要探讨的组织不同于传统组织观念,是由传播而构成的组织。

本书注重经验研究,除了第一章梳理概念、阐述理论之外,其他章节的论述都是基于具体的、丰富的经验材料,即通过个案来展示、剖析传播构成社区的具体过程与机制。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空洞的说教,也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案例与本土经验。经验材料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于文本的话语分析,第三章的案例均是如此,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也来自文本分析。第二种方法是田野调查,

即通过现场观察与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尝试理解生活者自身的思想与逻辑。

有关“传播的社区”观念萌芽于笔者赴美访学期间。2001年9月,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撞击倒塌前几天,我来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市的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开始系统学习组织传播理论。时任该系组织传播方向带头人的是法裔学者库伦(F. Cooren)教授(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传播系主任),他深受法国学者福柯(M. Foucault)、克罗齐耶和欧洲其他学者(如吉登斯)影响,又有着深厚的语言学、修辞学背景,因此,他的组织传播观与美国流行的组织传播理论大为不同。美国的组织传播理论深受行为主义影响,偏重组织管理,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基本上被视为一种特别的管理手段;而库伦及其同道将传播视为组织得以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理念彻底颠覆了之前我对组织传播的理解,深受震撼。最初,我尝试将这种理念运用到我当时正在耕耘的博士论文之中。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美国的媒介批评现象,虽然不属于组织传播范畴,但是在分析美国的新闻记者通过共享观念而形成阐释性社区时,我开始运用阐释主义的组织传播理论加以解释,迈向了“传播的社区”的第一步。随后,我又更为自觉地将这一理念运用到有关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中,把一些媒介批评现象看做通过传播建构新闻业社区的过程。与此同时,我将视野拓展到其他合作领域,比如非典时期的危机应对、特奥会SO项目的实施开展等都是非典型的组织或社区案例。即使在经典的组织和社区研究中,“传播构成”的观念也指导我在民间组织的公益传播、社区认同建构等研究中独辟蹊径,取得一系列成果。这些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陆续发表在《新闻大学》、《开放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评论》等杂志或论文集中。不过,在当时的研究中,我并未明确提出“传播的社区”这一概念,如今回头重新审视这些经验材料和分析,瓜熟蒂落,“传播的社区”浮出水面,于是就有了本书。因此,本书可以视为12年来我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一次收获:在大量经验研



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阐述“传播的社区”概念,从传播的角度探讨社区构成与组织的过程与机制。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社区与组织传播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并与社区与组织的其他研究形成对话,共同促进社区建设与组织发展。

前言 / 1

第一章 社区:传播的构成 / 1

第一节 社区建构:从邻里到共同体 / 2

一、社区与邻里 / 2

二、社区与组织 / 5

三、社区与网络 / 8

四、社区与共同体 / 10

第二节 社区构成:经由传播而组织 / 13

一、理解传播:观念与维度 / 15

二、经由传播而组织 / 20

三、建构性社区与构成性社区 / 23

第二章 地域性社区:虚拟与现实 / 30

第一节 媒介、传播与社区重构 / 31

一、城市社区重构的意义与困境 / 31

二、媒介与社区建设 / 33

三、作为社区治理媒介的网络论坛 / 36

第二节 虚拟社区与嵌入的空间 / 45

一、社区网络论坛与新媒体事件 / 46

二、社区网络论坛与社区空间的重构 / 49

三、社区网络论坛的困境与前景 / 62



第三节 社区空间实践与地点制造 / 66

一、空间生产、地点制造与主体性建构 / 68

二、空间实践与社区传播 / 72

三、J市“健身坡”的案例解读 / 75

第三章 建构性社区:协商与共识 / 86

第一节 合法性协商与权威性建构 / 89

一、作为话语的媒介自我批评 / 90

二、作为中国新闻专业规范的知情权话语 / 93

三、协商知情权——协商专业合法性 / 96

四、协商知情权——协商专业边界 / 100

五、规范的修补 / 104

第二节 认同危机与专业边界重构 / 106

一、有关付费采访的媒介批评 / 107

二、新闻业的认同危机 / 111

三、“新闻场”的重构 / 114

第三节 媒介话语与专业意识生产 / 117

一、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自我意识呈现 / 119

二、媒介话语实践与新闻专业身份建构 / 126

三、媒介话语实践与专业关系协商 / 131

四、新闻专业意识建构的意义与缺憾 / 136

第四节 话语争斗与专业认同建构 / 137

一、二元对立的媒介批评话语 / 138

二、作为话语策略的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 / 143

三、两种话语对于新闻专业认同的意义 / 150

第四章 构成性社区:组织与合作 / 153

第一节 赋予意义与组织生成 / 155

一、危机中的组织传播:赋予意义 / 157	
二、危机中的组织建构:修辞性联合 / 161	
第二节 共意动员与认同建构 / 166	
一、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 167	
二、个案描述 / 169	
三、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共意建构过程 / 171	
四、志愿主义:共意建构的悖论 / 177	
第三节 绘制合作领域地图 / 179	
一、合作领域与地图绘制 / 181	
二、个案描述 / 183	
三、合作领域地图绘制的内容 / 186	
四、合作领域地图绘制的方式 / 194	
第四节 合作领域生产的二重性 / 201	
一、民间组织、公益性集体行动与合作领域 / 201	
二、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认同建构 / 206	
三、公益行动中的组织生成与联盟建构 / 211	
四、合作领域生产的两重性 / 216	
附录 个案调查的访谈提纲 / 218	
参考文献 / 224	

第一章

社区:传播的构成

社区一词,承载了人们诸多美好的愿望与设想。无论是在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政治话语当中,还是在公民社会构建的学术研究框架之内,社区建设都是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是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传播学对社区的关注相对较晚,且多集中于社区媒体之类具体的事物;虽然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等学者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社区人际互动网络,但是这些媒体与网络主要仍被视为社区的“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Kim & Ball-Rokeach, 2006)],很少有人将传播看做社区构成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中,传播大多是以具体的、局部的方式介入其间。这事实上反映了对于传播与社区的双重误解。一方面,人们将社区视为具体、先验的存在物,尤其是当社区概念与特定地理空间相联系时,更是如此。这种观念忽略了社区的多样性与流动性,也没有看到社区作为建构产物的特性。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传播的理解也比较狭隘,主要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待传播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忽视了意义生产、文化传承等维度的传播内涵,更缺少从构成性方面思考传播对于社区的意义。由于这两个关键概念的理解缺陷,有关社区传播的研究始终未能拓展开来。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标即厘清关键概念,梳理相关关系,阐述“传播的社区”的基本观念。第一节主要探讨作为社会建构的社区概念,梳理其发展脉络,辨析其基本含义,并与本书其他相关概念,如组织、网络



等,进行比较与联系。第二节借助于组织传播有关理论贡献,搭建传播构成社区的理论框架。

第一节 社区建构:从邻里到共同体

中文社区一词来自于英文 community 的翻译,而英语世界有关社区的理念,又深受德国学者滕尼斯的影响——滕尼斯以 Gemeinschaft 区别于 Gesellschaft,这两个词通常被译为 community 和 society(社会)。不过,滕尼斯著作的中译本(1999)却没有将 Gemeinschaft 译作社区,而是译为了共同体。从社区与共同体这两种表达方式即可看出,人们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全面、准确地表现出另一种语言中的概念含义,译文的选择本身体现了译者的意图与当时的语境;而概念在特定语境中的发展、变化则又反映了人们实践与思想的发展、变化。因此,大致梳理社区一词的意义变迁脉络,有助于理解人们对于社区的期待与建构。

一、社区与邻里

作为社会学一个关键概念,社区的定义并不统一。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Hillery, 1964)就曾对 94 种社区(communitiy)定义进行比较,他发现这些定义的差别主要沿着两种方向展开:一种思路强调地域和地方基础(territorial/locality based),而另一种思路则侧重于社会或网络关系(social/network relationships)。这一差别所反映的矛盾,一直围绕着有关社区的讨论和研究。不过,似乎多数人倾向于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希勒里当时即发现有 69 个定义都包含了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等三个基本特征。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学的观点,实际上强调了社区的地域性,排除了非地域性的关系网络。